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作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美] 詹姆斯·凯瑞 / 著

James W. Carey

G. 斯图尔特·亚当 潘忠党 / 作序

丁 未 / 译

作为文化的传播

“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修订版）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Revised Edition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作为文化的传播

「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修订版）

〔美〕詹姆斯·凯瑞  
James W. Carey / 著

G·斯图尔特·亚当  
潘忠党 / 作序  
丁未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Revised Edition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 (美) 詹姆斯·W. 凯瑞 (James W. Carey) 著；丁未译．—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4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ISBN 978-7-300-26641-1

I. ①作… II. ①詹… ②丁… III. ①文化传播-文集 IV. ①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1422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作为文化的传播 (修订版)**

“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美] 詹姆斯·W. 凯瑞 著

G. 斯图尔特·亚当 潘忠党 作序

丁未 译

Zuwei Wenhua de Chuanbo (Xiudingban)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中印联

规 格 170mm×24mm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张 18.25 插页 2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74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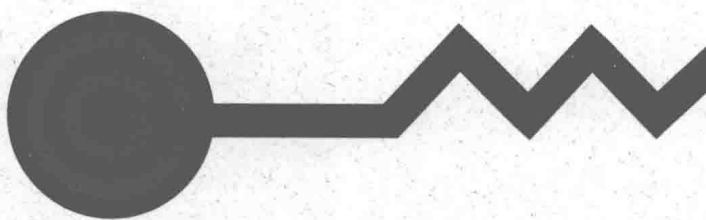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

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展江 何道宽 /主编

#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知识的传承，学校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则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译介，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少数中译本如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神。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



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并不以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划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和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为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宏、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编委会**



## 关于修订版



在这本经典著作中，詹姆斯·W. 凯瑞 (James W. Carey) 认为传播不只是信息的传递，通过揭示“传播” (communication) 与“共同体 (或社区、社群)” (community) 在词义上的关联，他拓展了传播的定义，认为传播包括了将人们聚为一体的文化。沿着这个脉络，凯瑞对美国只注重大众传播社会与政治控制功能的学术传统提出了质疑，他充分论证了传播的内容是符号的意义，而不只是发生传播的动机或是传播所服务的目的。他致力于重塑传播学研究的目标，从试图探寻行为的确定性规律转为更加单纯但又更具挑战的学术使命：“通过理解他者的言说来拓展人类的交谈 (conversation)<sup>①</sup>。”

新的版本增加了 G. 斯图尔特·亚当 (G. Stuart Adam) 的序。该序言解释了凯瑞在大众传播研究转型过程中之所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在于他的文化视角，并将凯瑞一系列的经典论著与当代媒介议题和趋势联系在

---

<sup>①</sup> conversation 在本书第一版中译为“对话”，经再三斟酌，本次修订版采纳了潘忠党教授在序言中的译法——“交谈”。conversation 不仅包含了人类日常性的交际行为，而且是凯瑞（也包括杜威）强调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实践，它来自最基本的口语文化和日常经验。“对话”通常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交谈”更接近 conversation 的原义。对 conversation 的理解具体见斯图尔特·亚当的序和凯瑞书中的相关论述。——译者注



一起。新的版本还增加了凯瑞所有著述新的、完整的著作年表。中文版又增加了当初将本书引荐至中国的潘忠党教授的序，此序对凯瑞的学术思想和影响力进行了梳理，并对凯瑞的新闻理想进行了补充。

詹姆斯·W. 凯瑞 1934 年生于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市。他先是在罗得岛大学取得了商学本科文凭，然后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Urbana-Champaign）分校，获得了传播学博士学位。1963 年他受聘于伊利诺伊大学并于 1967—1976 年间担任该校传播研究中心主任。1976—1979 年，凯瑞担任艾奥瓦州立大学乔治·H. 盖洛普中心的主席。1979 年他又回到伊利诺伊大学出任传播学院的院长，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 1992 年。此后他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任教直到 2006 年 5 月去世。在作为大学管理者、教师、传播学与美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先驱这一杰出的职业生涯中，凯瑞共发表了约 170 篇论文、演讲与评论。

本书汇集了詹姆斯·W. 凯瑞论文和演讲稿的原件，是从文化角度研究传播手段（communications）和现代技术的奠基之作。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杂志上读到第一版《电子革命的神话》（*The Mythos of the Electronic Revolution*，本书第五章）后致信凯瑞，对他“将学术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无畏的品格”表示赞赏。

麦克卢汉敏锐地认识到二战后几十年“大众传播手段”在机构层面上蕴含的巨大威力，同时他也强烈地意识到，狭隘的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者对人和文化机制的理解在学术上存在欠缺。他能够体认凯瑞的雄心是多么大胆和激进，因为凯瑞对由来已久的“传播”“大众媒介”和“电子革命”神话提出了质疑。当然，麦克卢汉本人也是如此。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导文化阐释的形形色色的学术或意识形态话语，凯瑞这种无所畏惧的优点却在于“破”。凯瑞的声音在我们当前的学术氛围中独树一帜且十分重要，尤其是他断然拒绝对权力的屈从，抵制在对文化形态的描述和阐释时，用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取代“神话的”“仪式的”和“人类学的”要素。

既矛盾又统一的是，这里所选的论文坚持从意识形态兼政治的维度分析媒介理论和实践，但它们都本着温和、多元和开放的精神。文化不是单



向的过程，这是凯瑞一贯坚持的潜台词。社会经验的主流模式势必过度简化了文化交往 (cultural transactions) 中包含的合作、交谈、仪式化分享或互动等要素；而所谓的“进步”模式 (“progress” model) 同样也是简约的，它给既定的权力和思维方式戴上了一副合乎逻辑的面具，而且也同样低估了个体的和公共的文化互动层面。

自然，交谈和合作是本书的精华所在。美国多元主义者、哲学家约翰·杜威 (John Dewey) 和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为我们确立了这一精神，我想凯瑞对这些思想的运用，以及他对克利福德·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哈罗德·英尼斯 (Harold Innis) 等当代思想家的观点所做的大量而清晰的引述，一定对我们的读者有所帮助。我更希望凯瑞这种包容的精神、对僵化术语的抵制以及他关于文化的多元、民主的观念会赢得更多的读者，包括教育工作者、学者和有公民意识的读者。

大卫·桑本 (David Thorburn)

# 序 一

ix

G. 斯图尔特·亚当\*

詹姆斯·凯瑞是博学的师长、有原创精神的理论家和卓有建树的大学管理者，更是他的学生和朋友们灵感源泉。2006年5月23日他的去世对每一个受过他感染的人来说，就像我们学术生命中独特而优雅的一章戛然而止。不过，凯瑞可能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的世界里，生命不是一个个章节写就的书本，生命是一场场交谈（conversations）留下的印迹。1991年春，他在波因特研究所（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新闻学院）接受访谈，当被问到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凯瑞坦然回答：

不存在什么最后的想法。我一直引用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一段精彩的话：生命是一场交谈。当我们进入时，交谈已在进行，我们只取一瓢；在交谈还没有结束时，我们却已退场。所有实用主义者学到的第一课是：当我们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我们正在最后一次改写自己的传记；而我们死后不久，其他的人也在改写我们的传记——包括我们的孩子、配偶、朋友：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他说了些什么？他做了些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是一场交谈……

---

\* G. 斯图尔特·亚当（G. Stuart Adam），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荣休教授，波因特研究所（The Poynter Institute）新闻学荣誉研究员。



一直这样进行下去……没有人有最终的遗言，也没有最后的思想。这场交谈永远没有尽头。<sup>[1]</sup>

凯瑞去世时，这段录音从研究所的档案中被重新找出来，放在了网上。重闻其声，对我们是一种慰藉；与此同时，也令我们思考包括凯瑞本人在内的那些深刻思想的渊源及其所享有的盛誉。他这段话的意义远比它流传开来的时间和所传达的智慧来得重要。一方面，这段话本身有一种魅力，凯瑞总是能用有趣而富有创见的句子捕获我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这句话蕴含着他对方法论的重要见解：当凯瑞说生命是一场交谈时，他是严肃的。在他看来，想要理解社会秩序的来源与特征，就有必要从反思人类如何思考、制造符号并由此建构出共享的符号规则开始。在他的眼中，世界首先是而且最主要是词语的世界（a world of words）。人类创造符号用来架构、传播思想与意图，用这样的符号来设计实践、事物与组织机构。换言之，他们利用符号以建构一个可以共同生活的文化。因此，对于凯瑞和约翰<sup>①</sup>而言，万物之初是词语（words）。在凯瑞的世界中，生命是一场交谈。

当然，细节要复杂得多；1989年出版的《作为文化的传播》（第一版），就是凯瑞探讨这些细节的论文集。该书可以作为一组以传播、文化和技术为主题的相对独立的论文，但合在一起也可以当作一个连贯的思想体系。在18年的写作过程中，面对来自他学术生涯周遭环境的种种挑战，凯瑞著书立说，致力于以（文化）这个特殊的点来阐明他看待事物的方法；终于，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为他富有原创性的、错综复杂的理论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展示机会。

凯瑞传承了一系列学者的思想轨迹。最初他受杜威等人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背弃了其他著名的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思想传统。凯瑞对杜威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读，并向他的学生和同事推荐杜威的研究理路。可以肯定的是，凯瑞的著作发行甚广且影响显著；但坦率地说，假如凯瑞成功说服了大家都去追随杜威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本著作的第二次出版了，换

<sup>①</sup> 指《圣经》“约翰福音”中的约翰。——译者注

言之，目前学术界对他所倡导的研究转型还存有抵触情绪。因此，本书的再版与当年第一次出版同样应景，用凯瑞的话来说，交谈还得继续。借着这本书和其他的论文，今天凯瑞的声音仍然铿然在场，他向我们发起挑战，让我们思考如何探索社会，或更准确地说，如何更好地研究传播和文化。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伊利诺伊大学求学期间，凯瑞的基本思想已初露端倪，他一生始终捍卫这一思想。1934 年凯瑞出生于罗得岛州北普罗维登斯市，他在那里长大并在罗得岛大学取得了商科文凭，随后他求学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伊利诺伊是他大部分原创性著述的诞生地，他曾任该校新闻学教授（1963—1976）、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1969—1976）和传播学院院长（1979—1992）。他也曾到艾奥瓦州立大学任职过一段时间（1976—1979），1992 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任教，直至去世。

1963 年凯瑞获得博士学位时完成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哈罗德·英尼斯的，另一篇则探讨了经济与传播的关系，他凭着后一篇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在 2006 年发表的一篇访谈中，凯瑞告诉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他当时对第一篇论文不太满意，所以没有递交（Carey and Grossberg, 2006: 17），但这篇重要的论文最后以《哈罗德·英尼斯与马歇尔·麦克卢汉》为题发表于 1967 年春季的《安提阿评论》（*Antioch Review*）上。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伊利诺伊大学的墙外从此揭开了一场漫长的学术战役的序幕。

凯瑞对英尼斯欣赏有加，对麦克卢汉就没那么热情洋溢。不过，论文的开篇是这样的：

在人类社会的所有研究者中，只有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令大众传播的历史成为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中心。他们都看到了媒介不只是社会的附属物，而是社会肌理（social fabric）的决定性因素。（Carey, 1967: 270-271）

将媒介与传播从附属物上升至首要动力（prime mover），代表着方法论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它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其中包括凯瑞对接受技



术决定论一直颇为抵触，也为此而困扰。但关键是凯瑞将传播现象（及其技术）从社会理论与分析的背景地位移到了前景的位置，以此来理解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传播的“漫长的革命”记录了西方社会尤其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史，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正如凯瑞在本书第一版的引言中所说的：“现代传播手段（communications）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经验与意识的日常用语、兴趣与感觉的日常构成、人们通常对活着和所处社会关系的感知。”（Carey, 1989: 1, 2）一个新世界由此诞生，凯瑞试图用更好的方式来诊断（diagnosis）、理解新的现实，而不只是承认现实的存在。

xii 他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就想给类似的研究起个恰当的名称。在那次格罗斯伯格对他的访谈中，凯瑞说起当年在写毕业论文时，他读到了韦伯的理解（verstehen）概念及其社会行动理论，韦伯建议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就研究对象给自己的行动所赋予的意义进行研究并做出阐释，韦伯将这一研究取向命名为“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凯瑞非常欣赏这个研究方法，但不喜欢把文化跟科学合在一起。因此，他创造了一个词“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他早年任教时用它命名了当时的一个初级研讨班。他告诉格罗斯伯格：

文化研究在那时只不过是个术语，用来描述一些大家都认为有共性的研究，包括乔·古斯菲尔德（Joe Gusfield）、杰伊·詹森（Jay Jensen）、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符号互动论和芝加哥学派、肯尼斯·伯格（Kenneth Burke）、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以及少数文学批评家，当然还有马歇尔·麦克卢汉、哈罗德·英尼斯，还有一些愿意同与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positivism and positive science）持不同立场的人结为联盟的马克思主义者。（Carey and Grossberg, 2006: 21）

美国的文化研究就诞生在这一刻——至少就我们所知，它就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伊利诺伊大学的研讨班上，在那里大家开始关注凯瑞所列举的被称为文化研究学者的思想家们。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凯瑞阅读了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等英国学者的著作，并与他们进行了交流。这些英国



学者的研究虽各不相同，但有一定的相似性，都被冠以文化研究之名。再后来，凯瑞在《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本书第四章）中宣布了自己的目标：

文化研究……显示了放弃那些过时的科学原理的好处所在，并把大众媒介置于中心地位（而不是作为一个课题或学科）来研究社会理论的普遍问题：通过形形色色的变化与差异、冲突与矛盾，社会生活的奇迹是如何实现的？社会是如何进行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无论社会生活之生产和再生产的细节如何，社会（或我们最熟悉的事物）都是通过传播、通过符号与社会结构的整合关系，才得以创造、维系与改造的。（Carey, 1989: 109 - 110）

换言之，社会生活的奇迹如何发生的答案，从人类创造文化的能力中才能找到，这种文化由人们共同拥有的符号构成，它包括了人类行为与实践所呈现的意义，从言语和媒介领域去寻找答案，代表了社会科学的新方向。在本书开篇他的代表作《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中，凯瑞对这个答案的原创性和重要性做了颇具戏剧性的强调：“马歇尔·麦克卢汉说得不错：就像鱼并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传播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周遭环境（*ambience*）。”（Carey, 1989: 24）

xiii

对社会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兴趣统摄了凯瑞的整个理论思想，在此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交谈”（*conversation*）这个词是我们思考这一创造的载体。它让我们此时此地关注动态的、开放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首先关注社会组织和互动的常规化结构。凯瑞的目标是建构一个总体性理论，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创建和管理（社会）的手段。因此，他反对那些满脑子都是科学的研究者和功能主义者的工作，他们把社会看作某种既定的事物，功能主义者更是认为权威（*authority*）和地位（*status*）这些结构问题是关于社会的最有意思的东西。相反，在凯瑞看来，传播与交谈（*communication and conversation*）这两个词意味着塑造（*making*）、了解、判断和说出（*uttering*）这些社会过程，其在逻辑与观念上都要比吸引大部分研究者眼球的那些正式且熟悉的结构来得重要。正是在这个思想脉络中，“交谈”一词才显得如此卓尔不凡。正如凯瑞在《对“大众”和“媒介”的重新构